

济 南 市 五 十 年 文 学 作 品 选

文学评论



50

济 南 出 版 社

济 南 市 五 十 年 文 学 作 品 选

文学评比

济南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济南市作家协会编



济 南 出 版 社

一九九九年·济 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济南市五十年文学作品选/刘玉民主编

济南:济南出版社,1999.9

ISBN7-80629-266-7

I . 济…

II . 刘…

III . 文学 - 作品综合集 - 济南 - 当代

IV . I218.5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35823 号

济南出版社出版发行

(济南市经七路 251 号 邮编:250001)

济南市人民印刷厂印刷

(地址:济南市段店路 55 号)

1999 年 9 月第 1 版

199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6.8

字数:1600 千字 印数 1-2000 册

定价:(全 8 册)200.00 元

(如有倒页、缺页、白页,直接与印刷厂调换)

序 言

谢玉堂

摆在大家面前的这部《济南市五十年文学作品选》丛书，是济南市文联、济南市作协为庆祝建国五十周年而精心编选的，是我市作家和文学艺术工作者献给共和国五十岁生辰的一份真诚的礼物。

五十年在历史的长河里不过是弹指一挥间。但历史从来都不单单是以时间的长短作为标准的。平平庸庸、惨惨淡淡，几十年几百年可以一笔带过或者忽略不计；惊天动地、烈烈熊熊，几天或者几小时可以浓墨重彩、铜浇铁铸。从公元 1949 年 10 月 1 日开始的这五十年，尤其是改革开放后的二十年，无疑属于后者，属于几天、几小时胜过几十年、几百年，值得浓墨重彩、铜浇铁铸的那种时刻。五十年短暂而又峥嵘的岁月，书写了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上最为辉煌的一页，也书写了济南市五千年文明史上最为辉煌的一页。作为当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济南市的文学事业同样取得了前无古人的成就。据不完全统计，仅改革开放二十年来，我市的专业和业余作家，在国家正式出版社出版的各类文学作品就不下三百部，其中仅长篇小说就有六十多部。尤其是长篇小说《骚动之秋》荣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标志着济南市文学创作的成就和影响已推向了全国。也正因为此，当我得知文联和作协的同志有意要编选这套丛书时，当即表示了支持。这部丛书的编选出版，不仅

是对我市五十年文学事业的最好的检阅和总结，也是我市两个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成果，必将在济南的历史上产生深远而广泛的影响。对此，我愿表示最真诚的祝贺！

江泽民同志说：“文艺是民族精神的火炬，是人民奋进的号角。”回想三十几年前，当我还是一个热血青年的时候，正是读着《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红旗谱》、《红岩》、《苦菜花》等优秀文学作品开始革命道路和人生征途的。文学作品对于人的世界观的形成，对于人的精神境界、精神状态的影响是无可替代的，也是无论怎样估计都不会过分的。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人们习惯于把作家称之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作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我们的作家无疑是光荣的、值得人们尊敬和爱戴的，他们所担负的责任也无疑是重大而艰巨的。我希望真正有志气、有抱负的济南的作家朋友们，能够勇敢地担负起自己的使命，热爱生活，忠于事业，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和热血汗水，创作出更多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好作品。

济南是历史文化名城，李白、杜甫、王维、曾巩、苏轼、苏辙、关汉卿、老舍等曾经在这里留下了佳作名篇。李清照、辛弃疾、张养浩、元好问、王仕祯、蒲松龄等曾经在济南乃至华夏民族的文明史上写下了不朽的篇章。身为他们的后人，又处在今天这样一个充满希望的年代，济南的作家理应创造出无愧于古人同时也无愧于来者的业绩。作为市长和一名文学爱好者，我愿举起自己的双手，向济南的作家喊一声：“朋友们，努力啊！”

目 录

第一辑

杂文琐议	戴永夏	(1)
从《戊戌喋血记》谈历史小说	江晓天	(4)
文学民族性琐议	侯琪 侯林	(10)
当代小说观新变管窥	侯琪 侯林	(21)
浓酽的历史意识对文学的过分干涉	朋 星	(30)
对报告文学现状的点滴思考	朱向泓	(37)
文化寻根与《红高粱》现象	丁少伦	(42)
寂寞的心境与荒凉的小说世界 ——谈张爱玲和她的《传奇》	史挥戈	(53)
从《狂人日记》看“拿来主义”	张宗田	(60)
序言的困惑	戴永夏	(66)
提倡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 相结合的创作方法	张多彦	(68)
艺术中智者愉快的散步 ——试论随笔的审美特质	贺鸿凤	(76)
齐文化孕育的作家与作品	郭树荣	(88)
史诗的追求与困惑		

——对当代长篇叙事诗第一次创作高潮的探讨	潘晓生 (92)
“尚用”还是“尚文”：难以逾越的情结		
——由两种文化传统看文学的功能与价值问题	崔 莅 (102)
稻花香里说丰年		
——关于诗的断想	董向前 (112)

第二辑

评褚威格的小说《同情的罪》	从 耷 (118)
孔孚山水诗的特色与成就	徐北文 (137)
智者的微笑		
——杨绛散文漫谈	刘传霞 (145)
诗人的心灵历程		
——洛夫《边界望乡》的艺术启迪	郭 廓 (153)
巴金小说中奴性人格的悲歌	李书生 (156)
古韵斑斓		
——董桥散文印象	李慎生 (164)
汉字的弹性		
——余光中散文印象	李慎生 (166)
读《田仲济杂文集》随感	任 远 (168)
中州才女冯沅君	高夙胜 (174)

第三辑

热情的赞歌		
——读郭廓的诗	承 雨 (189)
致《骚动之秋》作者的信	江晓天 (193)

论岳鹏程	赵鹤翔	(196)
诗贵禅思		
——我读《无鱼之河》	李永祥	(204)
黄河之水天上来		
——读塞风的《母亲河》和《以往》	黄耘	(210)
一部歌颂爱国主义的优秀作品		
——读长篇小说《左宝贵》	阿茜	(215)
灵性·诗境·语言		
——读杨剑鸣	赵鹤翔	(218)
情系泉城 心连广宇		
——论谈任远及其散文	李永祥	(225)
《九班宣言》的宣言		
——读王欣的长篇儿童小说	许克成	(235)
再创女性文学的辉煌		
——浅论济南地区新时期的女性文学	严民	(240)
后记		(248)

戴永夏

杂文琐议

近读报刊上发表的一些杂文，砭痼弊，倡新风，探幽发微，鞭辟入里，颇有别开生面之感。但名篇佳作之外，一些带有“八股”味的东西，也时有所见。有的作者把写杂文看得过于容易，对一些严肃的社会问题，不假思索，信笔拈来，文意肤浅，以偏概全；有的总爱板着面孔训人，以谩骂、挖苦取胜；也有的无独立见解，人云亦云，拾人牙慧……这些，都是文风不正的表现。

写一篇杂文，短则数百字，长则几千字，比起写宏篇巨著来，确实要省力些。但是，要真正写得好，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鲁迅曾深有体会地说：“不错，比起高大的天文台来，‘杂文’有时确很像一种小小的显微镜工作，也照秽水，也照脓汁，有时研究淋菌，有时解剖苍蝇，从高超的学者看来，是渺小、污秽，甚至是可恶的，但在劳动者自己，却也是一种‘严肃工作’，和人生有关，并且也不十分容易作。”所以，有人把杂文称作诗与政论的结合，这也并非夸大其词。

作为一个优秀的杂文作者，不但要有较高的思想理论水平和敏锐的观察力，而且还要有较深的生活阅历、丰富的知识和熟练的写作技巧。只有“博观以约取”，“厚积而薄发”，才能在千百字的短文中谈天说地，道古论今，左右逢源，挥洒自如，把深刻的哲理寓于丰富的知识之中，使作品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和战斗力。唐弢在

《鲁迅杂文的艺术特征》一文中说过：“鲁迅杂文之所以颠扑不破，丰采焕发，除了思想内容正确外，还因为他掌握了丰富的社会、历史、科学、文化的知识，他有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知识宝山，这座宝山支持了他的政治热情和艺术活动，成为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驰骋自如的场所。”这些话，可谓道出了鲁迅杂文的真谛，也是许多杂文作家应该遵循的方向。粉碎“四人帮”后，报刊上出现了不少知识性和说理性结合得很好的杂文。老作家秦牧写的《鼠狗的风格》，就是具有代表性的一篇。这篇两千来字的短文，从鲁迅《狂人日记》中的“海乙那”，写到鼠狗的外貌、神态、风格，又由鼠狗联想到杰克·伦敦小说中的“第四种人”，最后又归结到“四人帮”的余党、亲信和帮派骨干上。文中既有丰富的动物学知识，又有鲁迅作品、外国文学作品知识；既有生动传神的描写，又有透辟恰切的议论；既有形象思维，又有逻辑思维。如果作者在知识、社会阅历和写作技巧上没有很深的动力，又怎能写出这样脍炙人口的名篇？

杂文的使命之一在于战斗，而战斗必须观点明确，以理服人。如果是揭露敌人的杂文，就要抓住论敌的要害，针锋相对地进行批驳，“一击致敌人于死命”。这里，一定的讽刺、斥骂都是需要的，但“嬉笑怒骂”，必须“皆成文章”，必须“使敌人因此受伤或致死，而自己并不无卑劣的行为，观者也不以为污秽”。如果是揭露人民内部矛盾的杂文，尽管也需要讽刺，而且这种讽刺有时也很尖锐，但其目的还在于提醒、教育和挽救，因此不能不加分析地乱戴帽子，乱放空炮。必须晓之以理，喻之以议，使人读后口服心服，才能发挥杂文的战斗作用。

杂文既然是战斗的，就必须具有自己的独到见解，给人以启发，以起到匡正时弊、讴歌光明等社会作用。倘不能提出新问题，老重复别人的观点，人云亦云，那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在这方面，我们仍应向鲁迅学习。在他的笔下，不论是几百字的小品，还是上万字的宏篇，其真知灼见，无一不像火炬烛幽显隐，似雷霆振

聋发聩，在社会上引起很大震动。而我们有些作者，不肯艰苦用脑，老喜欢跟在别人后面随声附和，看到报上有“伯乐相马”的杂文，就跟着写“伯乐相马”；当有人把曹操“割发代首”作为以身作则的美德来歌颂时，有些作者也不加分析，便纷纷写起赞扬曹操的“割发代首”来。这些杂文往往“常人厌之，阅不终篇，辄欲睡去”（鲁迅语）。所以出现这种情况，除作者观察、认识问题不够敏锐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思想不够解放，人云亦云，缺乏独立见解。我们要使杂文在四化建设中发挥重大作用，就必须解放思想，敢说真话，大胆地抨击腐恶，积极地颂扬光明。只有这样，杂文才能真正成为时代的“感应的神经，攻守的手足”。

（原载《山东文学》1980年第11期）

江晓天

从《戊戌喋血记》谈历史小说

《戊戌喋血记》我只是匆忙赶着读了一遍，未及深思，只能说一些读后的直感。我觉得这部小说，从帝王到工匠，从京城到穷乡僻壤，写了许多形形色色的人物，各种各样社会生活，自然风光的场景、画面。有一些人物性格描写有闪光处，例如，第八章三十七和三十八两节，写湖广总督张之洞见光绪皇帝两次隆逾，宣召谭嗣同进京，谭将要成为新贵，为了笼络，准备谭路过武汉时，隆重欢送。没想到谭嗣同悄然而过，不去拜见。巡抚谭继洵怕因此见罪于张，托人摹拟自己儿子谭嗣同的手笔，“写一个晚生贴子，向总督大人请安”，又备几样礼品和土仪，亲自登门拜访、解说。他以为这乖巧的一着，能蒙混过张。张之洞不露声色，但却识破了“这是敬老儿耍的玄虚”。他从“谭嗣同一向狷介不群，最厌恶我等官场中请客送礼这套旧俗”，判断谭不会做这等事情；他从两年前看过谭写的《秋雨年华之馆丛脞书》稿本，辨别出不是谭的手笔。由此刻画出了张之洞这个老于世故的官僚眼睛向上、窥测政治方向、圆滑精明、工于心计的性格特征。又如，第六章二十七节，写荣禄向慈禧进谗言，把翁同龢革职之后，在众人突然对翁冷漠之时，他虽一下子升任大学士兼新任直隶总督，“偏一反常态：毫无骄矜之气，却露出同情之态。他故意走到翁同龢身旁，轻言细语说了许多安慰话。这使翁同龢心中万分感激”。这一细节，生动有力地刻画出

荣禄两面三刀的性格。但下面还写道：“可是他哪里知道，这次突然降到他头上的巨雷，正是他的拜把兄弟荣禄播下的。”这似嫌多余。艺术需要含蓄，何况前边的描写已很明白，无须点破。（附带说一句，就通篇来看，我也感到作者对艺术需要含蓄注意不够，下功夫不足。）还有其他一些人物性格上也有闪光之处，不一一赘述。但就人物性格的完整性或叫作“写活了”来说，倒是宦门出身的花花公子张立人这个人物，给我留下较深的印象。此人写得很真实，有时代感。总之，这样大部头的作品，在短短三五年时间内写出来，写到这样，应该说是难能可贵的。另一方面，恕我直言，读了之后，总感到作品对戊戌政变这一重大历史题材，思想上开挖得不深，艺术的结晶化程度较差，剪裁、结构方面也存在一些缺陷，诸如情节提炼、集中概括不足，枝蔓不少，脉络、层次不够清晰等。

下面就历史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统一（或叫一致）的问题，结合这部作品，讲一讲个人的想法和看法。

首先，从原则上说，写当代题材的小说要从生活出发，写历史题材的小说应从历史生活的真实出发。更应严格地遵循这个原则。艺术的真实应该是形象地准确地反映历史运动的规律、历史社会生活的本质。两者相统一（一致）的前提、基础只能是历史的真实。做到这一点，有两个问题要处理妥当：一个是重大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不能虚构，具体的细节作某些移植、改造，应该允许，但不宜张冠李戴；更重要的、也是往往难以很准确地把握住的是，历史人物的作用和历史人物的性格相统一，既要客观地、科学地写出他在历史上应有的地位，也不能简单化、漫画化，更不能现代化。这个问题，一直有争议，特别是不少史学家与一些作家、艺术家有不同看法。现在有，今后还会存在，不断地进行研讨、探索是很必要的。我的历史知识很少，无法从史学的角度考证历史小说里的真假，只能就《李自成》一、二卷的编辑工作中遇到的和感觉到的，

说一点粗浅的看法。1960年初,听到史学界对郭老的历史剧《蔡文姬》提了不少意见,集中在历史的真实性方面。所以,姚雪垠同志的历史小说《李自成》第一卷,1962年底排出大样后,专门请明史专家吴晗同志、既熟悉这段历史又精通文艺有丰富创作经验的阿英同志和曾经专门研究过明末农民运动史的专家李文治同志看一看,听取他们的意见。李文治同志十分肯定李自成这个人物写得真实,吴晗同志也给了相当高的评价,阿英同志又给予热情的支持。姚雪垠同志为什么能处理得使史学界一些专家认为是符合历史真实呢?原因固然有多方面,但我以为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他不是凭借史书、前人的结论、条条、框框,把它形象化地表现出来,那仅仅是图解;而是博览强记,掌握大量材料,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进行分析研究,深刻地、准确地把握住历史运动的规律、特点,对历史事件、人物得出自己的评价和见解。比如对李自成、刘宗敏等历史人物的评价,对李自成失败的原因等等,他都有自己的新见解。用他自己的话,就是“深入历史,跳出历史”。文艺的特点之一,是个性化,要有独创性。要创新,不光是艺术形式方面,还有内容方面,要求作家对生活有独到之见,历史小说更应如此,因为人对事物的认识是不断深化的。史书的结论是前人研究的成果,他们不但有时代的局限性,就是对大量史料的占有,今人应比前人有利些,更何况今人有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思想作指导。我以为,写历史小说的作家,应该用这一高标准要求自己,树立这个雄心壮志。由此,我虽一时说不准确,但总感到这部小说的作者,对戊戌政变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深入的、全面的分析研究不够。

前面说过,我不懂历史,对戊戌政变不敢妄加评说。但是,我想,戊戌政变和任何事物、历史事件一样,它的发生和失败,都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恩格斯在《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一文中说过:“任何地方发生革命震动,总是有一种社会要求为其背景,而腐

朽制度阻碍着这种要求得到满足。这种要求也许还未被人强烈地普遍地感觉到，因此还不能立即得到胜利。”^① 这个原理，也适用于我国近代史上的戊戌政变。这次“革命震动”的发生、失败的条件、原因、经验教训何在？这正是作者要通过艺术的形象，特别是对主要代表人物性格的刻画，生动、鲜明、有力地作出回答的。可是，我读完之后，却感到模糊不清。比如，对慈禧这个人物，作为封建保守势力的代表，她的特征是什么？表现在哪些方面？不清晰。她所以能一举扑灭维新派，恐怕主要的不只是她个人的政治经验和权术手段，还有她所代表的这个反动的政治势力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还有相当的基础和力量。另一方面，维新派代表人物，革命的势力还比较弱小，无经验，等等。又如，光绪和谭嗣同这两个人物，同是主张维新，但应有差异。光绪要搞变革，是因为他感到不能再照老样子统治下去了，至少这一点，与谭嗣同为代表的维新派，应该是有所不同的；对谭嗣同这个人物，作者只注意把他作为一个维新革命的英雄，着重从多方面赞美他，却没有（至少是不够）从多方面挖掘，充分有力地写出这场失败了的革命的代表人物的悲剧命运的历史必然性。因此，没有能够写出人物性格的丰富性，能够没有通过丰满的、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鲜明地反映戊戌政变的历史局限性和复杂性、失败的必然性、它的历史作用和历史经验教训，以达激动人心、发人深思的艺术效果。

还有剪裁不精确，提炼不足，结构显得松散。小说，应以刻画人物为中心，这个常识谁都知道，但实际做到颇为不易。一般地说，应避免叙述事件过程。比如中日甲午之战，从日本进军朝鲜写起，作为戊戌政变的直接起因，应予交代，但要不要正面写，实写，可以考虑。后边，要不要一直写到自立军失败，也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而戊戌维新派的被扑灭，是中心事件，主要情节推进到高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01页。

潮，应该抓住，大起大落，充分展开来写，从各个方面、各种角度，来写各种各样的人物。可惜，作者放过了。我猜想，这与作者对前后一些事件的描写过于铺展不无关系。

艺术创作，在从生活(历史)出发的前提下，为了更好地塑造人物，充分有力地反映生活(历史)的真实，对某些次要情节进行细节描写，对某些生活现象加以移植、改造，合理的虚构，必要的夸张，都应该允许。如果这些起码文学表现手段都不允许，还谈得上什么创作？比如，姚雪垠同志对崇祯和杨嗣昌这两个历史人物的描写，有些史学家有不同看法，认为：杨嗣昌是个庸才；崇祯虽不同于一般末代皇帝，但也不是那么事必躬亲，励精图治的。姚雪垠对这两个人物这一面的描写，的确作了相当的夸张。突出写杨嗣昌的精明干练，说明在崇祯可信的辅臣中，没有比他再能干的人才了；突出写崇祯宵衣旰食，亲理朝政，更显示出历史运动的规律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从而深刻地反映了历史的真实。有时为了突出人物的个性，在同类型人物身上，甚至可以把近代人物身上的某些细节，移植到古代人身上。例如，姚雪垠写张献忠在考虑杀不杀某人时的一个习惯动作，捋胡子，用力一揪，就是杀；轻轻放下，就是不杀。这是从韩复榘身上移植到张献忠身上的，作为草莽人物，他们有共同点。总之，在艺术创作、表现手段上，作者有广阔的余地，充分的自由。文学和哲学不同，和史学也不同，它要写出活生生的人，不是对一个人物作几条评价结论。我觉得，作者对慈禧和光绪这两个人物的内心世界，没有下力去作更深广的开掘，写得简单了，或者叫做单薄了。

最后，就结构问题罗嗦几句。长篇小说的结构很重要，也很难处理，它是作家艺术构思具体化、条理化的结果。展不开，收不拢，两方面的弱点都容易发生。这部小说，是放得比较开的，但故事情节进展的层次不清晰，段落感不强。各种艺术门类、形式的某些表现手法要借鉴，以避免单调，利于创新。最近，电台广播《杨家将》，

电视台转播外国的系列片，颇受人们欢迎。由此联想，长篇小说需要考虑考虑我国古典章回小说结构方法的继承问题。姚雪垠的《李自成》，虽未用章回标题，但是他在结构上是吸取了章回小说的一些处理方法的。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历史小说的语言问题，更复杂些，既要性格化，又要有时代感。我觉得，《戊戌喋血记》的行文是流畅、明快的，但对话太长，有的地方，使人感到作者在通过人物之口，说自己要说的话，性格化较差。同是一个人物，往往在官场说话的用语和日常生活用语是有不同的。有时在不同的心理状态、情绪之下，对不同的人物说话，用语也有些区别。所以，作者对人物的对话语言，要很精细地斟酌。叙述语言、抒情的描写，通过作品人物和作者的不同角度，行文用语也该区别。语言的恰当运用，直接关系到小说艺术色彩的绚丽与否，需要精益求精才好。

(原载《读书》1981年第1期)